

蒋伯英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走出困境的 毛泽东

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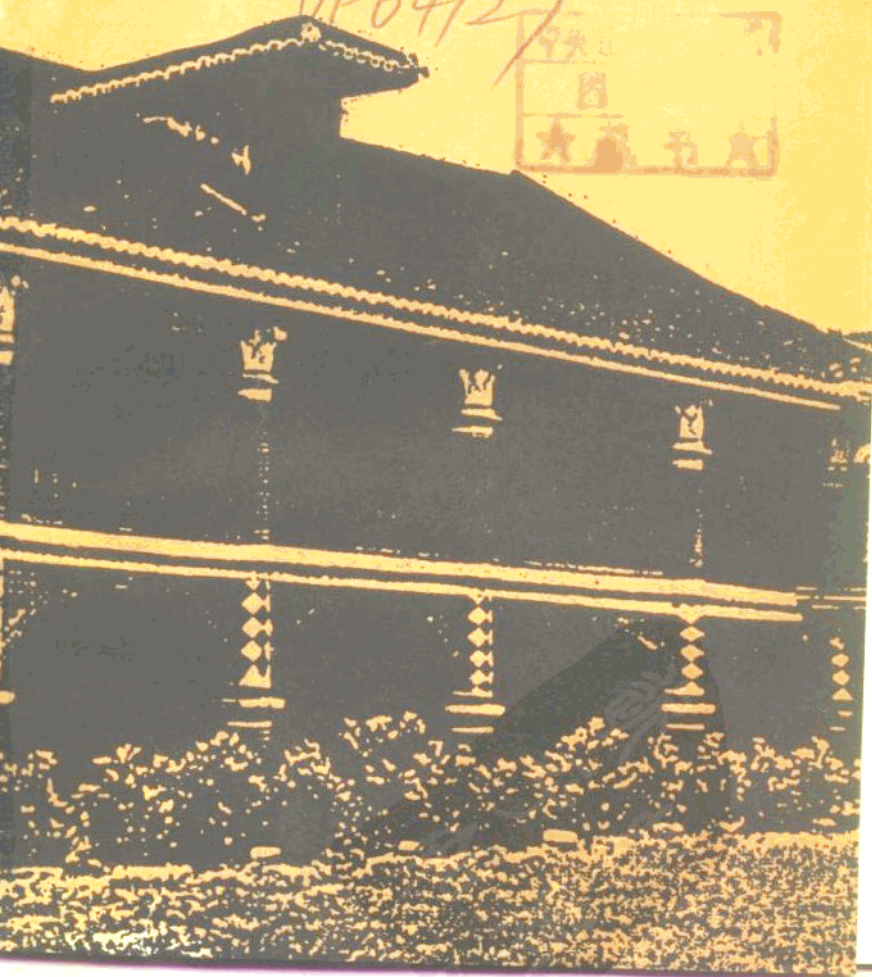
A752
83

94144

走出困境的毛泽东

• 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报告

DF64/27



闽新登字 01 号

走出困境的毛泽东

ZOUCHU KUNJING DE MAO ZEDONG

——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报告

蒋伯英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 59 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州七二二八工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19.375 印张 4 插页 459 千字

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211-02267-1
A·4 定价: 17.40 元

书中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200009908

序 言

1936年7月，43岁的毛泽东住在陕北保安的一个窑洞里。当时，这座在黄土高原上被残缺不全的古老城墙和红军防御工事层层环抱着的小山城，是中国苏维埃区域的临时首都。刚刚来到这里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凭着他职业的敏锐，第一次这样细致地描述了他所见到的毛泽东：

“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霎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在做着手势。……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

“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

“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①

这就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年毛泽东的形象。在斯诺看来，当时这位被他称之为“苏维埃掌权人物”的毛泽东，似乎不可能成为中国的“救星”。但是作为一名年仅31岁的外国资产阶级报纸的记者，斯诺却不能不承认，在毛泽东身上具有一种天命的力量，一种异乎寻常的活力。这种不可思议的活力，产生于他对中国民众，特别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困饥饿、宽厚大度却又敢于造反的农民的迫切要求。斯诺断言，假如他们这种要求变革社会的愿望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复兴中国的动力，那么，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有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看来，斯诺的观察与判断大致是正确的。在过去的10年中，准确地说是在1925年以后，毛泽东始终把农民要求变革旧有的生产关系、反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剥削的愿望，当做他奋斗的动力和主要目标。当然，他和他同时代的共产党人一样，把马克思主义看作引导自己祖国获得独立解放和通向共产主义的唯一

①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出版，第61～65页。

途径。但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具体运用方面，他却有着与众不同的理解。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比任何一个中国共产党人更加强调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他由赞同以城市为主实行民主革命，很快转变为主张以农村为中心；由提倡城市暴动转而率先上山去创造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而又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

就如他那豪放潇洒的墨迹那样，毛泽东一旦认定自己的奋斗方向，就一往无前，很少被教条困扰，也不因某种传统的戒律所束缚。他精力充沛，一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似乎时刻都在思考着如何创造。哪怕是一条行军路线，或者寻找击破敌人的一个突击点，他都用心筹划，独辟蹊径，以致连他的对手也不能不叹服毛泽东别出心裁、神奇莫测。

毛泽东有着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胆识过人的实践。他广征博引的理论依据和有时使人大惑不解的行为，往往带有某种超前意识或者富于创造性的特征，因此也往往难于为一些人理解和接受。他特别不能容忍那种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模式，即使是对于来自中共中央以至共产国际的那些不切实际的指令，他也极力加以抵制，或是在实践中创造出更加有效的方式取而代之。

大概由于这种种原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一些主要领导人以至共产国际方面人物的眼中，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被看作不讨人欢心的革命者，尽管他们并不否认毛泽东超群的智慧和才华。例如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的主要分歧者之一、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军事专家奥托·布劳恩（即李德），他一方面攻击毛泽东“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维方法”，却同时又不能不承认毛泽东的实践“效果还是明显的，因为它们毕竟适合了一定的具体情况”。

这就不难想象，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期间，毛泽东在许多情况下处在一种受压抑和被否定的地位。特别是在1935年遵义会议

之前的4年，他虽然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主席，1933年又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但事实上他在中共中央几乎没有发言权；相反，他往往处在被支配的位置上。由于这一特定的历史原因，毛泽东同他的上级和分歧者矛盾迭起，论争不息。其结果不难想象，毛泽东不断地受到排斥、打击以至纪律处分。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听听毛泽东1956年9月10日在一个会议上的讲话：

“我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至于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比如，不选作中央委员，只给发言权不给表决权；撤销一些职务，如中央农民委员会书记、党代表（井冈山时候）、前委书记等。‘开除党籍’了又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个党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你说开除党籍对于一个人是高兴呀，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后头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①

显然，毛泽东对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大约20次的处分和打击愤然不平。因为他深信，他的那些主张是马克思主义，而那些自封为“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人却往往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因此他说：“似乎马克思主义只有一家，别无分店，是不是分店也可

^① 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9月10日），载《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

以搞一点马克思主义呢？”^①事实证明，毛泽东在山沟里搞的那个“分店”，倒是实实在在实行了马克思主义，当然，那是已经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绝不是书本上写的欧洲式或者俄国革命式的马克思主义。道理并不复杂，毛泽东为他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了这样的辩护：“因为中国的革命是在乡村里头先搞，乡村里搞革命的人学到了马克思主义。你说山上没有马克思主义，我看山上确有马克思主义，因为大家都上了山，有这么多根据地嘛！”^②

然而，正如大家已经共同认识到的那样，毛泽东并非一贯正确，也不是常胜将军。在土地革命战争风云激荡的岁月里，他也有过不少失误。就如他自己谈到的，他所指挥的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的江西高兴圩之役、1932年7月的广东南雄之役、1935年1月长征途中一渡赤水的土城之役，都打了败仗。他甚至还坦率承认被人们普遍推崇的由他制订的《井冈山土地法》“很蹩脚，不是一个彻底的土地纲领”；在中央苏区“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③

这就是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毛泽东，一个普通而平凡，伟大而闪烁着灵光，以致整个世界都能听到他脉搏跳动的令人感兴趣的人物。

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我一直被毛泽东富于传奇色彩的一生和他个人历史上散发出来的魅力所吸引。但是我深知，以我个人的学识和能力，以及研究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对毛泽东的一生作全面的研究。因此我选择了毛泽东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这一段落，进行初步的探索。

这10年，是中国革命史上十分重要的阶段，在毛泽东的生涯

① ②③ 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9月10日），载《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

中更是具有特别的意义。在这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毛泽东外受蒋介石数十万大军的压迫，内受来自上级和左右的排斥打击。然而正是在这极其困难的境况下，毛泽东带着数千人的农民起义军，创造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他和朱德等人领导的三万五万名装备简陋的红军，击破了人数在10倍以上的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围剿”，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的奇迹。在这10年间，毛泽东凭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赋予他的智慧和毅力，凭着他的聪明才智和实事求是精神，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形成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中国式的革命思想。在这10年间，中国革命几经危机，毛泽东也历尽劫难而大难不死，反而在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引导中国革命由土地革命战争阶段顺利地转入到抗日战争阶段。可以说，土地革命战争的10年，是毛泽东个人由不那么成熟到成熟，毛泽东的思想在中共党内由非主流到主流，毛泽东在中共内部的地位由受到贬斥到被尊奉为全党最高领导者的复杂转变过程的10年。事实上，在这10年当中，毛泽东对中共 and 红军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表明了中共由幼年走向了成熟，中共在国内的地位由非法到合法，并且实际上成为了推动和促进全国抗日战争的主导力量。

正是出于上面的那些感受，我觉得这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神秘而复杂的研究课题，于是在去年年初萌发了写作这本著作的念头。这项研究和写作计划很快得到了福建人民出版社的支持。我用了一年时间，终于完成了书稿的写作。当然，这部书不完全是研究毛泽东个人历史的传记著作，也不是中国土地革命战争史。我的意图是要把这两个不同研究范畴的内容尽可能有机地联结起来，以毛泽东的思想和活动的演变为主线，从一个侧面来反映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与历史进程。但是写作的时间是如此匆促，所要表达的内容又是那样浩繁丰富，我深感力不从心，只是期望通过

这一粗浅的研究，加深对于毛泽东的认识，得到史学界同仁、读者们的指教帮助。

蒋伯英

1993年3月

目 录

第一章 毛泽东与大革命浪潮中的	
农民运动	〔1〕
一 同陈独秀分道扬镳	〔1〕
二 受到压抑的土地革命	〔11〕
三 到实践中寻求答案	〔21〕
四 从共产国际到毛泽东的土地方针	
.....	〔31〕
五 危机与决策分歧	〔44〕
第二章 在失败中崛起	〔55〕
一 武汉国共合作局面的终结	〔55〕
二 转折关头	〔64〕
三 关于秋收起义纲领的争论	〔72〕
四 走向井冈山	〔85〕
第三章 艰辛的开拓	〔100〕
一 初创苏维埃	〔100〕
二 改造农民革命武装	〔115〕
三 土地革命的初次尝试	〔130〕

四 艰苦转战与朱毛会师·····	[140]
第四章 重开割据新局面 ·····	[155]
一 边界进入全盛时期·····	[155]
二 挫折与转机·····	[167]
三 深入土地斗争·····	[181]
四 “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演进 ·····	[194]
第五章 闽西的曙光 ·····	[206]
一 艰难的“围魏救赵”行动·····	[206]
二 “长汀果然是一个转折点” ·····	[217]
三 “收拾金瓯一片” ·····	[231]
四 朱、毛论争与红四军“七大” ·····	[244]
五 移居闽西山村·····	[256]
六 一个建军纲领在古田诞生·····	[262]
第六章 压抑、探索与创新 ·····	[273]
一 遭受排斥的“乡村中心”论 ·····	[273]
二 进兵赣西南·····	[286]
三 寻乌调查与思想升华·····	[299]
四 沉重的使命·····	[311]
第七章 “围剿”与反“围剿” ·····	[326]
一 曲折迂回的转变·····	[326]
二 “诱敌深入”与各个击破·····	[339]

三 横扫敌军七百里·····	[354]
四 千里大转战·····	[368]
第八章 折冲与浮沉 ·····	[386]
一 王明上台与毛泽东去职·····	[386]
二 独辟蹊径下漳州·····	[402]
三 毛泽东再遭批判·····	[418]
四 毛泽东的支持者蒙受株连·····	[439]
第九章 王明路线终结与权力转换 ·····	[458]
一 围绕土地路线的一场较量·····	[458]
二 致力于经济建设与农村调查 ·····	[480]
三 在中央苏区的最后岁月·····	[493]
四 在历史转折点上·····	[511]
第十章 从对抗走向合作 ·····	[530]
一 赤水两岸·····	[530]
二 张国焘的挑战与毛泽东的胜利 ·····	[547]
三 “抗日反蒋”与“逼蒋抗日” ·····	[567]
四 第二次携手合作·····	[583]
本书主要参考书目 ·····	[603]
后 记 ·····	[607]

第一章 毛泽东与大革命浪潮中的农民运动

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时，党仍然在陈独秀操纵之下。……他压制所有的反对意见，奉行右倾机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政策。对于当时党的政策，特别是有关农民运动的政策，我非常不满意。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更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和武装起来，开展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更早并更有力地在全国发展起来。

——毛泽东·1936年

一 同陈独秀分道扬镳

当历史演进到今天，人们已经能够认识到大革命失败的那些

重要原因，也都知道 1927 年党的“八七”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是引导中国革命由失败走向胜利的关键所在。然而在当时，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为了使全党逐渐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必须开展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的革命运动这一切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真理，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在引导全党转变这一认识的过程中，毛泽东是最主要的代表。

在大革命的中后期，毛泽东所担任的主要职务是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同时还兼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并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委会组织部长的职务主持着全国农民协会的工作。一方面由于职务上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基于对农民问题所进行的长期深入的调查研究，他深知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并且在艰苦的探索中得出结论：“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①这段话十分明确地表达了毛泽东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这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形式是农民革命。毛泽东的这个论断在后来的实践中得到了验证。

然而在那个年代，陈独秀对于毛泽东的主张不屑一顾。陈独秀所重视的不是农民问题，而是寄希望于资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获得胜利，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等待资本主义在中国有了充分发展之后的遥远的将来，再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甚至认为

^① 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1926 年 9 月 1 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版，第 38 页。

将来如何，也没有预计的必要。正是在这样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理论的指导下，大权在握的陈独秀在革命成败的关键时刻，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毛泽东关于重视农民问题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意见。

毛泽东与陈独秀在农民问题上的分歧，实际上就是关于对中国革命中心问题的分歧。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毛泽东并非一开始就十分注重农民问题。在他投身革命的那个年代，被称作“南陈北李”的陈独秀与李达，是无数追求革命真理的热血青年的崇拜偶像，也是影响着一代青年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一面旗帜。毛泽东并不例外，他也正是这批热血青年中的一个。也就是说，毛泽东在同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新村主义等色彩斑驳的思潮决裂，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向着这个方向发展的最初阶段，陈独秀曾经给了他重要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告诉斯诺：“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①至于涉及到中国革命核心的农民问题，还没有多少材料能够证明陈独秀对于毛泽东有过积极的影响。

不能否认，陈独秀对于农民问题也曾经进行过初步的研究，在理论上也承认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然而他在实践上则始终抱着轻视乃至反对的态度。从整体而言，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不久即把农民问题列入议程，除了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彭湃、恽代英等许多杰出的领袖都曾对此展开研究。沈玄庐领导的浙江萧山衙前农民协会减租斗争和彭湃领导的广东海丰农民斗争，则是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农民运动的最早范例。从1922年至1925年初先后召开的中共第二、三、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也都探

^①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第41页。

讨过农民问题。这些会议的文献肯定了农民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中共与工人阶级只有组织与领导农民投入经济与政治的斗争，革命才有成功的希望。然而，这些理论只是停留在纸面和口头上，未能制订具体的实施工农联盟和解决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的方针与措施，更没有在实践中加以体察和运用。所以，中国共产党在那些年内尽管领导与发动了许多次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并成功地实现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但是由于尚未与3亿多农民结成可靠的同盟而失去了农民革命力量坚强的支持，因此工人阶级的斗争往往陷于孤立而遭致挫折。

应当承认，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最初几年，不仅是陈独秀，而且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其他共产党领导人，都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于城市工人运动。为了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毛泽东不仅担任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长沙分部主任，在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湖南发动许多次工人斗争，并且直接参与组织和领导了对中国革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

直到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才比较一致地感受到，过去轰轰烈烈发动起来的震撼了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历次工人运动，主要是在大中城市中动员和组织了工人阶级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起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反动统治。然而他们发现，在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往往在其自身利益受到影响或者遭到强大的反动势力压迫时，很快发生变化，有的向反动势力妥协，其中一部分甚至转入到反动阵营中去成为打击工人阶级的帮凶；而小资产阶级虽然具有革命的热切要求，但无论从其自身力量或是革命的坚定性方面，都显得十分脆弱。因此，工人阶级在大规模革命斗争兴起的时候，总能以强劲的势头带动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向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发起进攻；但为时不久，那些同盟者往往相继离去，工